

一、前言

馬克思在提及中國社會時，常把她當作一個落後發展地區的典型例子，並以此反饋來突顯出資本主義的活動，進而把中國形容成一個時間在那裡停滯不動的社會。誠如他所言，中國是一個指「背逆時間像植物一般懶洋洋地成長的社會」。然而在〈共產黨宣言〉裡，中國被他當做是一個喻例，用來說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趨勢，按照他的理論，在每個地區每個領域，資本主義摧毀了各個社會的中國長城式的屏障，強有力地將它們納入自己的運行軌道。¹或許這有一點諷刺的是，當初馬克思所指涉的這個背逆著時間像植物一般懶洋洋成長的社會，如今竟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堡壘。當初馬克思正是以資本主義全球化方式將中國納入歷史發展的陰影部份，然而後來中國共產革命者（中國共產黨人）卻是恰妙的利用這種歷史發展趨，力圖擺脫這種懶洋洋成長的形象，希望中國得以進入世界歷史之中，不再做為其歷史的附屬地位而存在。

長久以來，學界對於馬克思主義能在俄國甚至是中國落地生根，進行無數的反思苦想。而馬克思主義畢竟是建立在社會主義且必須以資本主義為先決條件這一假定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正是馬克思主義才告訴人們，只有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才能創建出使社會主義具備現實

¹ 馬克思,〈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584-591。

的歷史可能性的工業前提，並同時造就出無產階級必然會成為歷史現實的社會力量。然而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擁護者毛澤東，卻巧妙的利用農民的力量，實現了一場成功的革命。²

誠然，試圖在一個經濟落後，工業不發達的國家進行革命，並非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之獨創。第一次馬克思主義革命發生在一九一七年，即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俄國，三十二年之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有則通過一條異於俄國的革命道路，在一個更加落後的國家——中國，取得了政權。在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裡，他們形成一條新的革命勝利後的道路，它的最終歷史評價至今還難以明確的界定。

基本上，本文是認為毛澤東利用馬克思主義揭示出中國社會的具體特點，並制定一種在具體歷史條件下充分利用革命可能性，又顧及革命局限性的總體戰略。因此，馬克思主義方能對中國共產革命產生現實意義，並成為行動的指南。而毛為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共產革命進程上發生作用，就必須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m）。然而，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否就是一種理論的再創造，這引起我的研究動機。在中國革命實踐過程中，毛澤東是否意識到馬克思主義要能在落後的中國發生作用，就必須進行中國化的政治工程，這是一個極待吾人釐清的課題。不過真正令筆者想釐清的是，馬克思主義在進行傳播甚至成為一種革命的意識型態理論的同時，是否也必然會走上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道路？而毛澤東在建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治邏輯為何？從全球化的角度來審視毛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又有何全球性的意涵？上述種種問題，是以下本文分析的主要課題。

² 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2-3。

二、共產國際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看法

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革命的論述，主要是以列寧與斯大林的看法為準則。而列寧、斯大林對東方革命理論的建構，是植基於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的基礎上，進而對東方殖民地民族革命的論述，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讓俄國布爾什維克化（Bolshevizing）的革命經驗，能夠為東方殖民地民族革命提供理論依據。不過列寧、斯達林亦相信東方革命與俄國革命，在革命性質與革命策略上是有所區隔的。

列寧在一九〇五年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乙文中，總結了俄國革命戰略與策略，並進而對農民在革命運動中的角色、無產階級領導權，以及民主革命與社會革命之間的關連性作出理論上的突破。在有關農民在革命過程中的作用，列寧認為農民革命的特質本是布爾什維克革命意識型態的一部分，農民本來就有可能成為革命的力量。³列寧相信，資產階級農民有可能在反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加入城市無產階級陣營；之後，農民無產階級則會與城市無產階級結合一起，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列寧認為農民革命活動必須由以終身職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黨來領導，因為無產階級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原則，是無法被挑戰的。⁴

除此之外，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亦指出資本主義為革命對象的社會主義革命，將以帝國主義為敵人的被殖民國家的民族主義革命結合一起。⁵列寧在此承認民族主義對革命力量是有促進的作用，對於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有幫助的。

從上述，可以看出列寧在東方殖民地革命理論的建構上，企圖賦予

³ 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的兩個策略〉，《列寧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頁13。

⁴ 前揭書，頁14-16。

農民革命力量與民族主義革命力量的用心。與此同時，列寧也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共產革命不僅與西歐各國不同，就是與俄國十月革命相比也有自己特點。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全俄東部各民族各民族共產黨組織，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指出：

你們這些東方勞動群眾的代表，面臨著全世界共產黨人所沒有遇到過的一個任務，就是必須以共產主義的一般理論和實踐作為依據，適應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特殊條件，你們必須找到特殊形式，我們在小範圍內即在我們國家內實現了任務，你們將在大範圍內，即在一些大的國家內予以實現。它們的解決方法無論在哪一部共產主義書本裡都是找不到的，但是在俄國所開始的鬥爭中卻能夠找到，你們應當提出這種任務，並依據自己的經驗來解決這種任務。⁵

從列寧對東方共產黨人所作的報告中，可以得知，列寧的論述確定了三個思想：第一，東方各國（中國是東方一大國），由於國情不同，革命所面臨的任務也有所不同，因此，他的革命道路自然也不同於歐洲和俄國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第二，革命沒有統一的方式（模式、方法、途徑等），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必須根據自己的特殊情況，運用一般共產主義原理，找到特殊形式，以便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第三，共產主義的書本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歷史條件下，革命總會遇到許多新問題，在共產主義的書本上是找不到現成答案的，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能根據自己的經驗

⁵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北京：解放社，1949年），頁117-164。

⁶ 列寧，《全俄東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第二次代表大會報告》，《列寧選集》，第三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23-324。

解決這些問題。⁷

不過在這裡筆者需要提出一點說明的是，雖然列寧承認東方革命有其特殊形式，且與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道路不同，但他仍然強調無產階級文化霸權的地位是無可取代的，並且在東方革命推展的過程中，仍須在城市發展組織培養無產階級幹部，以防止東方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會走向反革命的方向上去。

綜觀列寧的東方革命策略觀點，民族主義與農民革命的潛能，已被列寧融入其無產階級革命觀點之中，而且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前提下，東方殖民地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屬性得以被保證、被貫徹。爾後，不管是共產國際的執委會或是承繼列寧地位的斯達林，都接受列寧關於東方革命性質的觀點。共產國際更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作出以下決議：

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最重要的問題是農民問題。革命民主傾向的勝利，取決於四萬萬中國農民同中國工人一同參加決定性的革命鬥爭。並接受工人領導的程度。⁸

由列寧和共產國際的觀點，再比較毛澤東關於農民革命角色的論斷，可以看出毛澤東的農民武裝革命理論的「獨創性」是被中共學界過分誇大的。就在共產國際於一九二六年發表上述決議時，毛澤東於同年也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一篇文章，毛澤東在文章最後總結道：

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

⁷ 丁禎彥，《哲學的變革——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問題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5-6。

⁸ see Chen Jerome, *Mao and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09.

階級，是我們最親近的朋友。⁹

毛澤東的上述看法，其實正與共產國際的立場一致，因為民族革命的勝利與否，都取決於工業無產階級（工人）領導程度。就像列寧一樣，斯大林認為中國共產革命在某些程度上，是不同於俄國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性質，因此斯大林認為，中國必須先經歷像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經驗，首先進行屬於自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斯大林認為中國共產革命基本上是反帝國主義的，而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是反對沙皇性質。因此共產國際以「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民主專政」一詞來指稱中國的資產階級經驗是不可能完全布爾什維克化。根據列寧、斯大林甚至共產國際的看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m）具體實踐範圍，基本上不得違背無產階級文化霸權、城市中心，以及在城市培養無產階級幹部等概念，亦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範圍只要不超出上述三項核心概念¹⁰即使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與布爾什維克化的馬克思主義存在嚴重差異性，這仍是為斯大林、共產國際所允許，甚至認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sainified Marxism）其實就是如列寧所言，是一種特殊化形勢下的馬克思主義。

自一九二七年後，隨著斯大林戰勝了托洛斯基派之後，斯大林關於中國共產革命的論述也減少了很多，指導中國共產革命工作落在第三國際（共產國際身上），因為此刻斯大林正忙於他的「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工作。不過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革命的態度，基本上仍承繼列寧、斯

⁹ 根據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一文中所指出，所謂半無產階級是由大部分的半佃農、手工業者、貧農、店員、小販所組成，而小資產階級包括自耕農、手工業主和小知識分子。詳見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9。

¹⁰ 溫洽溢，〈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東亞季刊》，第二十八卷第二期，頁192-194。

大林看法，即承認中國共產革命的特殊形勢與俄國的革命模式是有所區隔，因為共產國際此刻已經體認到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要全面布爾什維克化是不可能也不可行，但俄國布爾什維克化的革命經驗卻可提供借鏡，供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作為參考。誠然，如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言，任何特殊的民族語言，都是一種不斷隱喻的過程（Continuous process of metaphors）。¹¹而毛澤東所揭諸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一種不斷隱喻過程，毛看到中國共產革命的特殊形勢，並採取民族化語言，從而使得它能通過承認許多其它語言並不接受的分析方式，把普遍性規律（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特殊性（中國共產革命特殊形式）結合在一起。¹²

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歷程

要瞭解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要先瞭解列寧的馬克思主義俄國化歷程，因為毛澤東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設想並非一蹴可就、憑空而出。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按照中共的說法就是使馬克思主義適合於中國實情（即中國的實際），並使之與中國共產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問題。誠如大陸學者楊奎松所言，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情的結合，首先是在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與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認可下，而獲得理論的合法性。¹³亦即當中國共產黨尚未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實情制定符合自身社會性質需要的革命任務時，列寧透過對東方革命論述所形塑之帝國主義理論，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與東方殖

¹¹ Antonio Gramsci, *The Modern Prince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3), p. 110.

¹² Frederic JR Wakeman, ,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reface XI~XII.

¹³ 楊奎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4。

民地國家的反帝民族革命結合起來，而在東方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彰顯民族主義的意義。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轉化，亦即馬克思主義俄國化（The Russification of Marxism），在中國共產黨革命初期，由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與發展，並沒有提供足夠實行社會主義運動的階級條件與理論條件，促使中國共產黨只能借助毗鄰俄國的革命理論、革命經驗來滿足中國共產黨在精神方面和物質方面的需要，因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亦步亦趨的「以俄為師」的心理，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國共產革命缺乏其自身獨立性，共產國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革命的政策和策略。¹⁴後來及至毛澤東通過革命的實踐歷程和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甚至對斯大林與共產國際政策的反思，才衝破理論與政策的限制，從而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課題。

（一）共產國際革命策略垂範

正如前面所論及，比較列寧、斯大林甚至共產國際對農民革命角色的論斷，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於農民革命的角色與作用的論斷，並無超出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所設定範圍，不過毛澤東卻提出一項概念，即國民黨政權與農村蘇維埃政權這種二元權力結構在中國已經存在的事實，並且在不觸及無產階級文化霸權的概念下，進行對農村蘇維埃政權是有助於無產階級革命的詮釋。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革命初期，對中國共產革命的論述，大體上是追隨著共產國際的革命策略來開展的，在其〈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中，除了說明了一小塊紅色政權（即農村武裝政權）存在意義之外，更說明他對共產國際的革命策略所抱持信心，他說道：

¹⁴ 前揭書，頁3。

中國的民主革命內容，依國際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完成民族革命，並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¹⁵。

毛澤東認為紅色政權的存在（即國中有國）的現象，是一種以國民黨為代表的城市中心和農業地區的中國農民蘇維埃的二元權力結構，這種二元權力結構的存在前提，是因國民黨的分裂（軍閥混戰）、且又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而更形激化。所以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缺乏統一的政府以及軍閥割據所造成的不穩定因素結合起來，就是紅色權得以存在的前提條件。換言之，毛澤東此時認為紅色政權存在事實對中國共產革命是有幫助的。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五年間，毛一方面由於在黨內權威尚未確立，另一方面在革命策略上，毛還不敢公然與共產國際革命策略來對立，因此對於共產國際認為「中國將會出現革命高潮」的典型看法，毛還是小心看待，雖然在革命高潮的觀點上，毛沒有公開反對，不過在革命高潮多快時間會爆發上，毛則與當時黨內領導人李立三有嚴重歧異。李立三觀點是認為革命高潮將會在一年內爆發，城市裡的工人階級將會響應革命，因此不需做任何前提準備工作，而毛澤東亦認為革命高潮即將到來，而無產階級領導是革命取得勝利唯一關鍵¹⁶。關於毛澤東對革命高潮的看法，毛澤東說道：「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¹⁷

在上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間，毛澤東基本上是承繼共產國際

¹⁵ 毛澤東，〈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48。

¹⁶ Chen Jerome, *op. Cit.*, pp.151-152.

¹⁷ 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100。

的革命策略，但毛亦小心面對共產國際壓力，雖不致與共產國際對立，但亦揭諸農村武裝政權（紅色政權）存在對中國的必須性。如果說共產國際主要觀點是階級鬥爭的概念，那麼在中國，毛認為階級鬥爭的主要目標即是地主和資產階級，而這類階級鬥爭就必須用無產階級和農民聯合起來領導，換言之毛除了承認共產國際所主張的無產階級為革命主體之外，亦認為農民也是革命主體力量之一。

（二）毛澤東對共產國際革命策略的破與立

毛對共產國際革命策略，基本上是採取小心因應的態度，在盡量不觸及無產階級文化霸權概念下，建構其革命理論，但毛澤東敢於轉化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路線，並使之落實到中國實際上，最主要是受到多方面的影響。第一，中共面對大革命（1924-1927）失敗與三次「左」傾路線錯誤之後，深刻體認俄國革命模式，並不完全適合於中國共產革命，因此毛對於農村武裝根據地論述，有助於中國共產革命的開展，雖然此時毛尚未公然與共產國際對立，但農民的革命性卻被毛加以讚揚，這在一定程度上與共產國際所主張的城市中心，無產階級文化霸權的概念已經有一定程度上的轉化，第二，隨著國民黨政府對中國共產黨的五次圍剿，毛成功以游擊戰術使共產黨得以生存下來，這對毛在黨內地位也有所提昇。第三，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德國入侵蘇聯，這使得共產國際操控中國共產黨的程度大為減低，毛得以在理論上和組織上，清除共產國際派在中共黨內的影響力。¹⁸

農村武裝根據地革命經驗與游擊戰術的成功加上德國入侵蘇聯，共產國際無力東顧等因素，促使毛自一九二七年開始逐漸走向不同於共產

年），頁103。

¹⁸ 蕭延中主編，《在歷史的天平上》（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頁349。

國際的革命路線，然而毛澤東在建構自己的革命策略時，也不是一開始就與共產國際路線相對立，而是在因應中國共產革命實際情況的變化時，逐漸的走上異於俄國模式的道路。以下本文就下列幾個方面說明之：

1、軍事戰略上：

毛澤東認為紅色政權的存在有利於革命高潮的到來，而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形式的中國農民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¹⁹然而反觀共產國際則是認為紅色政權的建立是一項艱苦工作，只要工作好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力，再進行全國武裝起義即可。

在軍事戰略上，毛澤東的戰略理論要點是建立根據地、擴大紅軍和組織當地居民。²⁰但毛將上述戰略理論要點系統化，甚至與共產國際的軍事策略有所區隔，則是到了抗日戰爭的爆發，毛的戰略理論才日趨成熟。在其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所發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毛除了著重分析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還加以分析中國革命戰爭特殊情況，毛認為固然要尊重蘇聯的戰爭經驗，但更應尊重中國革命戰爭經驗，因為中國革命與中國紅軍有許多特殊情況。²¹雖然，毛到一九三八年所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術問題〉、〈論持久戰〉二篇文章，才對持久戰，游擊戰賦予理論化、原則化，但自一九三〇年以來，毛所建構的軍事戰略理論，同時也是對中國革命戰爭之特殊歷史情境的一種表達。

2、民粹主義路線

民粹主義（populism）對於毛澤東而言，是其解釋馬克思主義的一

¹⁹ 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前揭書，頁94-95。

²⁰ 陳葆華主編，《國外毛澤東思想研究述評》（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247。

²¹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前揭書，頁156。

個不可缺少的部份。美國學者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 就認為毛深受民粹主義的影響。在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毛不僅把農民看做革命的民眾基礎；更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黨才具備的東西，即革命創造力和政治判斷力賦予農民。²²

由於毛澤東相信農民的革命性，因此毛的民粹主義充分反映了落後的（但相對來說是革命）農村和經濟上比較先進的（但不革命的）城市地區之間的矛盾，並且表現出一種支持前者，而反對後者的革命傾向。²³ 因此毛澤東的軍事戰略理論也就建立在農民群眾支持的假設之上。所以有農村武裝根據地的存在，毛的游擊戰，持久戰就得以發揮功能，相對的若沒有農民群眾的支持，農村武裝根據地就無法建立和維持。

毛澤東雖然承認農民的革命性，但他卻未捨棄列寧主義的作用，他認為在革命實踐過程中唯有在群眾、紅軍和中國共產黨之間建立一種相互辯證的關係，否則將會不利於革命的推展。其實毛的民粹主義有下列三項之含意：第一、是強調黨和群眾之間的相互關係作用，而用來貫徹毛澤東的民粹主義方法就是「群眾路線」的原則。²⁴ 第二、是一種政治統治策略，即是一種動員農民群眾參與政治進程的方式，並把農民群眾作為社會革命的決定性力量。²⁵ 第三、是強調群眾的整體性，這種基本價值在遭到外敵威嚇便容易轉變成民族主義，即強調民族認同，共同抵制和排斥帝國主義力量的侵入。這種民粹主義隱含一種民族關懷，所以可稱之為民粹民族主義 (populist nationalism)，或民族民粹主義 (national

²² 莫里斯·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頁 97-99。

²³ 邁斯納 (Meisner)，前揭書，頁 114。

²⁴ 溫治溢，前揭文，頁 196。

²⁵ 俞可平，〈現代化進程中的民粹主義〉，《戰略與管理》，第一期 (北京：戰略與管理研究會，1997 年)，頁 89。

populism)。²⁶

根據前述，毛澤東的民粹主義既是一種政治統治策略也是一種民族關懷，而貫徹毛的民粹主義方法就是群眾路線。根據施拉姆 (Stuart R. Schram) 的解釋，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群眾路線是一種民主領導風格，但這種領導風格並不同於西方的自由民主。²⁷ 毛澤東認為正確領導，應該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亦即：

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意見），又到群眾中宣傳解釋，代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²⁸

但是從另一方面，根據鄒譚 (Tsou Tang) 的分析，就階級鬥爭的策略而言，群眾路線指涉一種「實事求是」的工作風，並緊密地與政治、社會、經濟、軍事等現實影響因素結合在一起，進而促使毛在革命實踐過程中，可以實行較緩和的政策，並且減少社會反對趨勢的抗爭。²⁹ 因此毛的群眾路線具有潤滑階級鬥爭所造成社會衝突的作用，更有發揮農民群眾和社會巨大的創造潛力。³⁰

3、黨的角色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意義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對毛澤東而言，是其理解農民群眾革

²⁶ 俞可平，前揭文，頁 91。

²⁷ Stuart R. Schram,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89.

²⁸ See Schram, *Ibid.*, p. 90.

²⁹ 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p. 18-25.

³⁰ Mark Selden, 《The Yanan Way in revolutionar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89-290.

命性的重要範疇。毛對於社會階級的分析，主要目的不在於研究中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結構，而是要確證民族解放運動過程中群眾的革命潛能。毛所說的革命群眾指的是農民，毛所要建構的不是無產階級意識，而是農民意識；而且只要通過政治鬥爭，農民群眾的意識就有可能被改造革命的解放意識。³¹換言之，毛認為農民群眾的革命意識不必然要受到無產階級政黨的貫輸，此與列寧主義的政黨理論已經有一定程度上的差異。

比較列寧與毛澤東的政黨觀，可以得出列寧是強調走菁英主義路線，爲了要保證職業革命家黨的領導效能與權威，因此黨必須是一個有嚴格驅力的組織，而且要依「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的原則來運作。³²民主集中制原則只適用職業革命家黨內部菁英互動，並不適用黨群關係上，因為黨群關係對列寧而言是上下從屬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反觀毛澤東的觀點，由於群眾路線是其思想核心，因此毛是反對絕對的菁英主義，但毛認為群眾路線是作為證成黨或菁英領導正當性存在的，由於毛強調農民群眾的整體性，因此在談及黨與菁英、群眾之互動時，毛仍主張以「民主集中制」作為其三方互動的中介橋樑，亦即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在毛看來是不能只限於黨內菁英互動原則。反對黨的「真理一元論」，認為唯有使黨進入群眾之中，去歸納整理群眾的集體意志、集體精神，如此黨與菁英、群眾之互動才能趨於平衡。

4、對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重新界定

³¹ Brantly Womack, *The Foundations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 1917-1935*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2), p. 81.

³² 民主集中制，即是共產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按中國共產黨大辭典的說法，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礎上實行集中，在集中指導下實行民主的原則。詳細說明，請參閱景杉主編，《中國共產黨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年)，頁206。

伴隨著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全面的侵入中國，這一事實讓毛澤東理解到中國半殖民社會性質的轉變，過去以階級鬥爭為主的革命型態必須做策略上的轉變。即是以民族統一的概念取代過去階級鬥爭的提法。而毛澤東巧妙地利用日本入侵中國的機會，運用民族主義因素來衝破共產國際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設定界限。根據美國學者諾曼(Levine Norman)的說法，毛澤東捨棄階級鬥爭的策略，轉而強調民主解放，意味著中共必須與資產階級力量結合。一九三五年，毛澤東提出新的統一戰線策略，除了賦予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革命屬性之外，還明確指出包含其他任何願意加入民族解放的所有階級。³³準此以觀，毛澤東此時已將中國共產革命轉變為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進而在中國未來政權形式的觀點上，也開始與共產國際的觀點有所不同。

5、建構新國家形式

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發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指出：「過去的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並沒有錯，但目前中國仍處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爲了因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情勢，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必須揚棄，「人民民主共和國」，才是當前適合的國家形式」。³⁴根據毛澤東的看法，人民民主共和國是在執行民族抗戰任務過程中與無產階級領導下建立起來的，按照社會經濟條件，它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國家，但是按照具體的政治條件，它應該是一個工農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聯盟的國家，而不同於一般的資產階級共和國。³⁵

爲了因應抗日情勢的發展，毛澤東提出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國家形

³³ Norman Levine, *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 (London: Boston: Allen & Unwin, 1984), pp. 354-355.

³⁴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239-240。

式，希望減緩階級對立情勢。毛指出爲了停止國內武裝衝突，共產黨願意停止使用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準備在新的民主共和國建設過程中，用立法和別的適當方法去解決土地問題。³⁶從這裡可以看出，就政治形式上，人民民主共和國不僅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同時就經濟條件而言，人民民主共和國基本上還是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³⁷但是毛仍然強烈指出，人民民主共和國還是有可能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力爭這一個方向。事實上，毛爲了賦予人民民主共和國有其合法性根據，轉而回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訴求上去，認爲中國共產黨應與國民黨一起重新整頓三民主義的精神，對外爭取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實現民主自由的民權主義增進人民幸福的民生主義。所以三民主義成爲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共和國的主要內容，但毛亦明白的指出中國共產黨有自己的政治經濟綱領。其最高的綱領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是和三民主義有區別的。³⁸

其實毛澤東在論述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必須揚棄的同時，毛所揭諸「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概念其實已經與共產國際路線有所區隔。換言之，毛認爲中國在缺乏無產階級霸權條件下，仍然有可能組織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及一切國內同意民族和民族革命的份子的聯盟進行革命，而且只要中國共產黨人民不放棄共產主義，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必然仍會朝向社會主義階段方向發展。在這裡，毛澤東不僅重新賦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新意義，同時他也提出一種新的國家形式，即人民民主共和國。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毛澤東將不同的國家形式區分爲三種類型：第一類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

³⁵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前揭書，頁243。

³⁶ 前揭書，頁240。

³⁷ 溫治溢，前揭文，頁199。

³⁸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前揭書，頁239。

第二類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第三類是幾個階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毛將第一類視爲舊民主主義國家，二次大戰爆發後，已經轉變爲資產階級的血腥軍事專政。第二類國家類型則是蘇聯的國家模式。第三類型則是中國代表著由殖民和半殖民國家的革命所建構的過渡時期國家類型，毛澤東認爲這是由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國家。這種新民主主義國家形式，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式。

³⁹

根據以上的論述，毛澤東已經正式捨棄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走一條異於俄國布爾什維克化的革命道路。而促使毛與蘇聯模式的分道揚鑣最直接因素是與毛澤東的民粹主義（populism）有關，由於毛澤東認爲農村和農民群眾是革命創造力的泉源，自然而然地對城市和知識份子便十分敵視，從而開始對共產國際路線有了懷疑，雖然毛澤東當時並不敢公然與共產國際對立，但自一九二七年以後，毛澤東所發表的多篇文章中，皆可發現他對農民革命長處是大力讚揚，而對於中國城市工人階級的政治作用，毛則是明顯地保持沈默。⁴⁰然而正是因爲毛澤東對農民群眾的信任，因此毛澤東得以衝破列寧主義關於黨的革命角色的看法，主張黨與群眾應結合在一起，而民主集中制則作爲黨和群眾的中界橋樑，進而建構群眾的解放意識。⁴¹

總體而言，毛澤東是在中國共產革命實踐過程中逐漸與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模式相對立，並且在這逐漸對立的過程中，毛澤東企圖使中國國情結合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並轉化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模式，建構適合中國國情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總的來看，毛澤東是在以下五個方

³⁹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636-637。

⁴⁰ 邁斯納（Miesner），前揭書，頁102。

⁴¹ Levine, *op.cit.*, pp360-361.

面，逐漸地與布爾什維克革命模式相對立：第一是中國化的軍事策略；第二是民粹主義的群眾路線；第三是重新賦予黨的角色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意義；第四是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重新界定；第五是建構一種屬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新的國家形式。上述這五個面向相互辯證促使毛澤東敢於轉化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實踐經驗，並使之落實到中國共產革命實際道路上去。此外，毛澤東在轉化布爾什維克革命實踐經驗的同時，上述五個面向也一起構成了毛澤東思想核心內容。直到中共建政後，在其〈論十大關係〉文章中，毛才徹底表現出與蘇聯模式（即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發展模式）正式決裂。不過，此時毛澤東已經完全打破俄國布爾什維克化的馬克思主義所設中國化界限，毛澤東的思想體系亦大體建構完成。

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深層意涵

對毛澤東而言，中共所要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包括了基本原理和個別論斷。前者是指以歷史唯物論或辯證唯物論為主的一套世界觀、歷史觀，以及用來支持這套世界觀和歷史觀的一套方法論；而後者指的是馬克思主義在特定時空環境下對特定議題所做論述，這種論述具有時空的侷限性，會因為時空的變異而出現適用性和合理性問題。⁴²然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普世文明，對毛澤東而言，所關心的是馬克思主義所揭諸世界觀、歷史觀和方法論若要在非歐洲國家產生任何影響，他所採用的民族語言，就必須為那個國家人民所接受。換言之，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源於西方的意識型態，如果不能適應中國人民的精神狀態並做出改變，那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革命過程就不可能發揮作用。⁴³亦即，毛澤東

⁴² 李英明，〈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台北：生智文化事業，1999年），頁5。

⁴³ Dick. Wilson,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New

相信馬克思主義對中共的革命實踐會有指導作用，但是具體行動綱領還必須靠中共從實踐過程中來不斷總結。

毛澤東堅信列寧主義就是在上述情境當中，對馬克思主義轉化的一種意識型態，亦即是俄國化的馬克思主義（Ruessified Marxism）就是西歐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俄國革命經驗相結合從而產生了列寧主義。職是之故，毛澤東相信馬克思主義要運用到中國來，也必須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轉化的工作，因此馬克思列寧主義幫助他找到革命的動力，使他在詮釋中國的同時也能夠給馬克思主義理論賦予一種中國的含義。⁴⁴然而毛澤東自一九二〇年宣稱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之後，他對中國共產革命的看法便一直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來進行理解，雖然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期間，中國共產黨處於一種逃命的狀態，甚至於中共的「六大」也不得不在蘇聯莫斯科召開，但在隨後的十年裡，由於毛澤東成功的運用自己的方式，從馬克思列寧主義那裡以及從中國農村實際革命經驗中受到啟發，不僅使中國共產黨得以保存實力，更促使毛澤東在黨內聲望有所提昇。⁴⁵

在中共放棄江西蘇區後的長征途中，毛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所舉行的遵義會議上，對那些未能保住蘇維埃共和國的國際派反守為攻，從而使自己成為了領著殘存的部隊到達延安的帶頭人，並成為黨內救亡的英雄人物。與此同時，一九三六年日本的入侵中國，毛澤東認為中國的革命運動變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獨立部份，現在中國需要的是承認她的特殊地位的合法性，並希望共產國際不要再像過去那樣對中國共產革命加以干涉。⁴⁶因此毛利用他日益增長的權威性來談論中國民族問題與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77.

⁴⁴ Ibid., p. 277.

⁴⁵ Ibid., p. 278.

⁴⁶ Ibid., pp. 279-280.

國際問題，進而花大量時間研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哲學，並設計新的政策和策略來適應革命新的形勢。毛澤東之所以要研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哲學，除了要證明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要比黨內那些受過莫斯科訓練的同志好些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必須證明任何人都能學習理論，去過莫斯科並沒什麼了不起，重要的是要能把馬列主義理論結合中國共產革命的實踐來學習。⁴⁷換言之毛澤東之所以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sm）或本土化的理由是不難理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個概念對毛澤東而言，是一種象徵，是其面對黨內共產國際派那種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態度，另外它的價值不僅是毛與國際派鬥爭的一種武器更是一種口號。⁴⁸換言之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可以在民族危機關頭用來迎合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亦即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套革命理論存在的價值，在於它能適應不同層次的民族現實，而並非一成不變地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套用到中國來。

其實，若我們具體考察毛澤東在三〇年代末期，對中國革命戰略和策略問題的分析，可以發現毛澤東在對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互動關係問題上，其態度是相當明確的。⁴⁹毛在一九三六年答覆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問題即「在共產主義革命勝利時，蘇維埃俄國和蘇維埃中國之間是否會形成政府實際上的合併問題時」，毛澤東指出：「我們為解放中國而戰鬥的目的，決不是為了將國家交給莫斯科！」，接著他更進一步闡述其答覆的依據：

中國共產黨只是中國一個政黨，在它勝利時，它必須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不能代表俄國人民講話，也不能替第三國際來統治，

⁴⁷ Ibid., p. 281.

⁴⁸ Schram, op.cit., pp. 69-71.

⁴⁹ Ibid., p. 88.

只能維護中國大眾的利益。只有在中國大眾利益和俄國大眾利益相一致時，才能說服從「莫斯科」的意志。當然，只有在中國大眾像他們的俄國兄弟一樣處於民主政權之下，並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獲得解放之時，這種共同利益的基礎才能大大加強。⁵⁰

上述這段話表明，毛在一九三六年時即意識到中國共產黨不應盲目服從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應該是一種平等、互利關係。亦即毛澤東認為若共產國際不尊重中國的利益，那麼在他指導下的中國共產革命政策就將採取不同的方向。不過在這裡可以看出毛澤東作為中國人的民族特性，他雖然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也相信中國共產革命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一部分，但他亦反對中國共產黨盲目服從共產國際路線，因為過去盲目服從共產國際的結果，差點造成中國共產黨的毀滅。職是之故，毛澤東認為唯有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規律與中國共產革命的特殊規律相結合，如此馬克思主義才不致於淪落為書本上的教條。毛抓住了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勢頭，在延安時期整肅了國際派，取得了中共意識型態的主導權，基本上統一了黨內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而毛在凸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本土化）的必要性的同時，其實已經挑戰了列寧主義的權威，只不過當時的國際環境使得蘇聯和共產國際並無法直接有效的制約毛澤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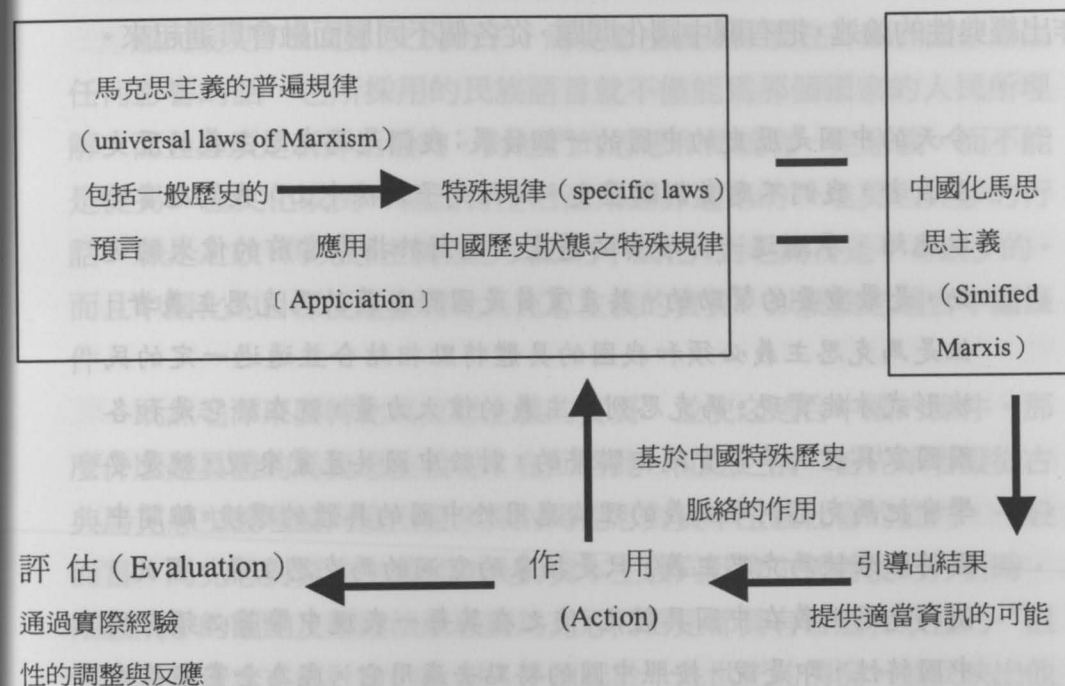
毛澤東通過以上向度，表達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即馬克思主義在未本土化之前是抽象的，本土化之後才會是具體的。因此，若按照舒曼（Franz Schurmann）對中共意識型態的區分，毛對馬克思主義中國

⁵⁰ 此段話係由美國學者施拉姆（Schram）根據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手稿複製而來。本文轉引自 Stuart R. Schram,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p.68.

化的訴求，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建中共意識型態的企圖。⁵¹毛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規律作為中共意識型態總體結構中的核心（純意識型態）部份，另外在革命實踐中所揭露的中國社會的特殊規律，以及伴隨著這些特殊規律，中共所採取的具體政策路線當作中共意識型態總體結構中的環繞核心的外圍（實踐意識型態）部份。因此，就毛而言，光有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規律並無法使中共的意識型態成為完整的結構，只有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規律和中國社會的特殊規律以及中共所採取的具體政策路線相結合，中共意識型態的整體結構才算完成。見圖 4-1。

⁵¹ 根據舒曼(schurmann)對中共意識型態的區分，中共意識型態可區分為純意識型態(pure-ideology)和實踐意識型態(practical-ideology)兩種，純意識型態是一套世界觀、歷史觀以及因著前者而來的是非對錯好壞的世界觀，和未來發展的藍圖。實踐意識型態則是包括一套對環境的認知圖、評估圖及對因應環境變化的戰略指導綱領，基本上，實踐意識型態具有階段性的策略設計及排他性的特質。其餘請參閱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p17-48

圖 4-1：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示意圖



資料來源：Nick Knight & Colin Mackeras, *Marxism in As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p. 90.

的確要精確說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對毛澤東而言，意味著什麼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因為不僅是在中國或是在其他非歐洲國家甚至是第三世界國家，馬克思主義「本土化或民族化」的號召，都意味著在許多不同層次上適應民族現實改變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些不同層次包括各個方面，從民族語言和民族文化及一直到馬克思所謂的龐大的前資本主義農業社會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此外，還涉及到哪些馬克思主義理論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什麼因素應當被中國化的問題。⁵²就毛澤東所理解的馬

⁵² Schram, *Ibid.*, p. 70.

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毛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作出經典性的論述，把有關中國化問題，從各個不同層面融會貫通起來。

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最重要的幫助的。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繫的，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瞭解並亟待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⁵³

⁵³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499-500。根據竹內實的考證，本文該段首次發表時的部分原文應為「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原文只有「馬克思主義」，收錄於《毛選》的版本卻變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原文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毛選》版則變成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參見竹內實，《毛澤東集》，第二版第六卷（東京：蒼蒼社，1983年），頁261。

顯而易見，上述引文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如果要在非歐洲國家產生任何影響的話，它所採用的民族語言就不僅能為那個國家的人民所理解，而且必須是新鮮活潑的，對他們的思想和傳統有一定意義，而不能是從另一種文化或另一種語言生活活劑翻譯過來的一堆莫名其妙的行話。⁵⁴職是之故，馬克思主義在形式上的中國化，對毛而言是不可缺少的，而且中國化的目標便是要轉化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以便使之適合中國條件。

既然毛澤東要轉化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並使之適合中國的條件，那麼什麼是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呢？在回答此一問題之前，首先筆者擬從古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向度出發來探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一般而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批判及對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分析時，階級鬥爭的觀點及辯證法原理對馬克思而言是都具有普遍有效性的。⁵⁵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是源起於十九世紀的情況，並反映出他特有的「西方中心主義」的觀點。因此，當毛澤東談論把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到中國來時，毛澤東基本上就已經在嘗試對馬克思主義中有關「西方中心主義」的論述進行「去西方中心主義」的工作。因此筆者認為毛澤東認知下的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其實就是在對馬克思主義的再創造，使之符合中國實情。

前面曾論及，馬克思主義對毛澤東而言，包括基本原理與個別論斷二部份，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轉化，（亦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說到底就是在「去西方中心主義」的前提下進行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個別論斷作一辯證性的結合。而這種不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容究竟為何？毛澤東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報

⁵⁴ Schram, *Ibid.*, p. 70-71.

告中即宣稱：「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更進一步號召中國共產黨全黨同志進行對馬克思主義轉化，即：

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對每一個問題要根據詳細的材料加以具體的分析，然後引出理論性的結論來。⁵⁶

從上述可以清楚看出毛嘗試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亦即就是採取無產階級立場、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辯證法的方法來進行對馬克思主義的轉化。換言之，在毛澤東看來馬克思本人的理論只是「西歐的馬克思主義」，但二十世紀初在俄國，列寧應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立場，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辯證法的方法成功的轉化了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俄國特殊社會情況結合，並從俄國社會特殊性中去揭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並使之具體落實到俄國革命上去。準此以觀，列寧主義對毛而言，就是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產物，而毛認為只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意思是講沒有絕對的馬克思主義，唯有從馬克思列寧主義中所揭示的立場、觀點、方法去結合中國實情，並本著有的放矢的態度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共產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如此馬克思主義才具有理論實際上的適用性。⁵⁷

⁵⁵ *Ibid.*, p.72.

⁵⁶ 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772-773。

⁵⁷ 所謂有的放矢的態度，按毛東的說法即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思列寧主義，「矢」就是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詳細內容請參閱，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9

由此可知，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本上是一種去西方中心主義運動的過程，也是一種特殊形式「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再現（representation）。從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的觀點來檢視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可以發現東方主義作為西方人理解東方的一種理論架構。東方主義為西方學者在研究東方時，提供一套規範化的寫作，其觀念、研究完全受適合於東方主義者的規則、看法及意識型態謬見所主導。⁵⁸亦即這種東方主義其實是一種帝國主義加文化侵略的產物。美國後殖民主義研究學者愛德華 薩依德（Edward Said）即認為西方人將東方視為落後、文明極低的地區，並以其「正義」、「自由」、「現代化」等漂亮詞藻進行包裝，企圖對東方擴張，型塑一種權力輪廓（configurations of power），並為其思想統治披上合理合法的外衣，但其帝國主義實質並沒改變。而且正是在帝國主義的軍事擴展和文化滲透、控制之下，才產生所謂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⁵⁹

從東方主義的向度來理解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可以進一步了解，毛反對將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東方主義，不加思索完全套用到中國決心，一方面除了中國共產革命現實出現理論適用問題之外，另一方面也是毛澤東他那民族主義的特性。所以毛是非常反對用西方思維方式（即文明/野蠻）進步/落後來看待中國革命，反倒是毛積極強調其落後優勢的觀念，認為過去中國共產革命失敗經驗，就是因為黨內同志不懂

月），頁753-761。毛東在這一篇文章精闢的論述了如何使馬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

⁵⁸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p. 202.

⁵⁹ 東方主義（Orientalism），按筆者對Edward W Edward, *Orientalism* 一書中的理解，東方主義有下三項深層含義：（1）指西方所謂東方問題專家，對他們所界定的「東方」作專門研究；（2）代表一種思維方式，即認為西方永遠凌駕落後的東方之上；（3）指一種統治方式，即西方對東方進行統治重構。是故東方主義是一特定的地理概念，泛指西方所建構殖民地區域，亦是一種政治文化概念，是西方殖民主義者所杜撰出來的「他者」。

應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情結合所造成結果。雖然毛澤東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並不反對全部的中國傳統文化，毛反而企圖使這些傳統文化的因素加以改造，使其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理論和方法。⁶⁰

總的來說，東方主義是西方人用來強化「西方/東方」、「歐洲/東方」以及「我們/他們」區隔的一套認知結構。⁶¹而毛澤東是反對馬克思主義以一種西方人理解下的東方主義形式來套用到中國共產革命上來。其實馬克思主義原先也是繼承了啓蒙以來西方中心主義的觀念，而經過了列寧主義以至於毛澤東的應用發展，馬克思主義歷經了去西方中心主義(de-westernism)的過程，出現了俄國馬克思主義(Russified Marxism)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Sinified Marxism)的現象。此外，在馬克思主義東傳過程中，列寧取得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文化意識型態霸權(cultural ideology hegemony)，從而塑造了日後的反資本主義陣營，並形塑這個陣營的主從結構，導致蘇聯中心主義的出現以及在如何邁向成熟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個向度上形成了特殊形式的「東方主義」。⁶²當然，從延安時期以來，中共在毛澤東的主導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動，曾不斷的挑戰西方中心主義和蘇聯中心主義或由此所延伸出來的特殊的「東方主義」的權威，而這種既要抗拒西方中心主義又要挑戰蘇聯中心主義的過程，追究起來其實就是中國中心主義化(Sinocentrism)的馬克思主義或中原中心主義的另一種激進的再現。

五、結論

綜上所述，學界對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評述大致上趨於兩

⁶⁰ Schram, *op. cit.* pp. 6-9.

⁶¹ 李英明，前揭書，頁152。

⁶² 前揭書，頁152。

種解釋。第一解釋是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質是毛澤東的中國中心論(Sinocentrism)的一種體現，以及犧牲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來強調中國的傳統和實際狀況。例如施拉姆(Stuart R. Schram)認為，體現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中的毛澤東對中西文化的態度，就是按照中國環境和中國文化的需要去修改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以他特別強調毛澤東對中國化遺產的重視，認為毛不但要在中國應用馬克思主義，而且毛澤東有一種發自內心的信念，即一種源於西方的意識型態，如果不能適應中國人民的精神狀態而作出改變，就不可能在中國的環境發揮作用。這種改變一方面是指「形式的中國化」(即語言表達上的中國民族化)，另一方面就是要在馬克思主義中注入「中國特性」。⁶³第二種解釋是從權力鬥爭的角度來說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只是毛澤東用來與黨內的共產國際派鬥爭的意識型態工具，並以此來區隔信奉正統的歐洲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的「本土」(reciding)。例如在羅伯特·諾斯(Robert North)看來，毛澤東修改了俄國的共產主義政治理論，以適應中國的特殊需要，以便於他本人登上權力寶座。⁶⁴

相較於上述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評述，澳大利亞的研究中國學者尼克·奈特(Nick Knight)則認為上述二種論點過於淺薄，奈特認為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種試圖去建立某中理論框架的嘗試；亦即在既不拋棄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的前提下，又能將這種普遍原理應用於一個國家特殊的歷史條件和文化環境。⁶⁵基本上，奈特企圖以一種綜合性的觀點來理解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奈特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非強調中國的實際情況而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而是使

⁶³ Schram, *Ibid.*, p. 67-72.

⁶⁴ Robert C. North, *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93.

⁶⁵ Nick Knight & Colin Mackerras, *Maxism in As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p. 84.

它作為一種思想理論體系的馬克思主義臻於完備。亦即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一種意涵，即只有在具體普遍性存在的歷史環境中，才能對作為完備的思想理論體系的馬克思主義作出界說。因此，雖然如懷利所說，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一個含有文化特點的用語。⁶⁶但是它並未要求超越馬克思主義在文化上的霸權，而是強調在不同文化歷史環境下，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規律將與體現著特殊狀態的特殊規律相結合。

總的來說，不論是從黨史或是從轉化論的向度來評估毛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本上，對於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輪廓的建構相信有一定程度的助益。不過，若從馬克思主義全球化的向度來評估毛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則可以發現毛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是全球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反映，毛用中國本土化的政治語言通過馬克思主義表達他對中國問題的關懷，以使社會主義的普遍化（全球化）能帶有中國的聲音。亦即是社會主義（包括馬克思主義）若要全球化，就必須通過民族主義的訴求，結合普遍主義和地方特殊主義的辯證發展，如此社會主義才具有歷史意義，而不是做為一種異國霸權的觀念而已。其實馬克思主義運動到其他地區，它在某種意義上走的就是「後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 的方向，而馬克思主義在列寧主義中，其「後馬克思主義」的意涵更加明顯。換言之，列寧主義本身就是以一個鮮明的「後馬克思主義」的姿態而出現的，由於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本土化的結果，亦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化趨勢的擴張與本土化結合的具體產物，所以列寧主義也是典型的「後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產物。相對而言，中國也是同俄國一樣走上相同的道路，簡言之，馬克思主義到了中國以後，也是走上了「後馬克思主義」的方向上去。⁶⁷「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完成，主要是在延

⁶⁶ Raymond F. Wylie, *The Emergence Mao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頁 52。

⁶⁷ 李英明，前揭書，頁 21-27。

安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動中獲得體現的。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之所以能擊垮國際派，主要是毛抓到了馬克思主義普遍化的擴張必然需以本土化結合的趨勢而走上「後馬克思主義」的道路，雖然毛從未揭櫫「後馬克思主義」的觀念，但毛所揭櫫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觀念，其實早已是一種「後馬克思主義」的形式。